

北大国发院
经济洞察系列

新 质

林毅夫 等

著

／

王贤青

主编

生产 力

中国创新发展的
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
探寻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作者：林毅夫 等著；王贤青 主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4年3月

ISBN：9787521763966

字数：166千字

序言

2023年的时光正在远去，但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将随之步入历史，渐行渐远。有些事物可能会长伴我们多年，甚至成为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就像1978年已远去，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一直闪耀至今。

新质生产力一词始于2023年，但注定也将拥有不凡的生命力。

新质生产力首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当月7日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必争的战略着力点

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环境与全球竞争发展的新趋势，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本书前两章最想给大家分享的要点。

哲学上有一组词叫量变与质变。量变引起质变，经济上同样存在量变与质变。当年的八国联军与后来的八国集团有七个重合，一个变更（奥匈帝国换成加拿大）。百年来，八强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

占比始终在50%左右，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历经百年发展，经济努力追赶，始终收效甚微。只有中国这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八国集团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国完全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世界上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这就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的世界经济格局质变。

这个质变有双重影响。对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虽然中国人均GDP暂且只有美国的1/6左右，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生产力水平并非平均分布，东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广深等超级都市圈早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准，很多企业 and 产业已经逼近世界技术前沿，甚至进入无人区。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生需求。

质变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外的。在中国崛起之前，世界上100多年来还没有哪个国家GDP占美国GDP的比例连续多年超过65%。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17.89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第三（德国4.45万亿美元）、第四（日本4.25万亿美元）、第五（印度3.73万亿美元）和第六（英国3.32万亿美元）的总和。中国早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无法隐身。因此并不是中国外交或传播的失败导致美国将竞争对手或打压目标锁定为中国，美国的反应是中国经济量变引起世界经济格局质变的必然结果。虽然外交与传播的优化可以改变美国打压政策的力度与节奏，但很难改变其方向，直到世界经济格局再有新的质变。目前质变的衍生反应就是，美国面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即将短兵相接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一定会严防死守，这是贸易摩擦、“小院高墙”的根源。再加上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落差本身也在缩小，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引进技术后吸收再创新的空间。

为什么一定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有一组概念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那就是渐变与突变。

中国经济本来还可以继续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一步步地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个世界本质上是渐变与突变的叠加，不是一条直直的斜线，而是一条波浪线，有时波峰波谷很大。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突变，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也都是巨大的突变。气候变化也不只是北方气温升高、降雨增多的渐变，而是伴随着极端天气的突变，就像郑州暴雨、涿州洪涝。

地缘政治的突变会使中国更难引进尖端技术，气候的突变也会压缩人们对碳排放的容忍度。欧盟已经开始实施碳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中国作为碳排放增量第一大国，尤其是即将成为累计排放量第一大国，必然面临国际上更大的减碳压力。同时，日益渴望美好生活的人民也越来越难以接受环境污染，如何加快发展基于绿色技术的新质生产力早已成为一道必答题。

还有一个突变来自技术。ChatGPT的问世和快速迭代，俄乌冲突中马斯克的星链的突然发力，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的非同寻常，这不仅关系到产业竞争力，还可能关系到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就像智能手机一样，不是我们拥有14亿人它就只拥有14亿人的传统手机市场，革命性新技术的突变性和全球通吃能力不容轻视。

如果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恐怕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这是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原来的“稳中求进”基础上又提出“以进促稳”的重要原因。

不争的内在逻辑链

理解新质生产力，我们不仅要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理解怎么做才科学。这是本书第三至六章想重点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管理学中有一句格言：既要正确的事，也要正确地做事。本来正确的事情，如果不能正确地做，轻则要付出不正常的代价，重则会使正确的事情变成错误的。

我们不仅要意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还要着力避免欲速则不达的问题，要认真思考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妨借助两组有辩证关系的概念来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逻辑。一个是“新质生产力”与“旧质生产力”。另一个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与新质生产力相对应，一定还存在“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然，其关系更像一座铁塔的塔尖与塔身、基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风筝与线之间的关系。塔尖必须建在塔身上（“次新生产力”“旧质生产力”），塔身必须立在基座上（制度安排、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要不断上升的，欲与对手试比高的塔尖。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塔尖越高，塔身必须越坚实，基座更是如此。“次新生产力”和“旧质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生产力的基本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先立后破”，就是基于这个逻辑。没有房地产、建筑、交通、钢铁、煤炭等“旧质生产力”，不仅中国经济很可能严重失速，民生艰难，而且也将没有力量支撑新质生产力。“旧质生产力”不必再加大力度发展，但也绝不意味着要加大力度破掉。

林毅夫老师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尤其是中高速发展，因为经济增速既影响经济总量，又影响经济结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果年均增长率不是达到8%以上，而是2%~3%，我们的产业结构大概率还徘徊在低端。

我们要努力避免的情况就是，中央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然后地方政府不分东西南北一哄而上，喜新厌旧。其实即便是北上广深等有条件发力新质生产力的超级都市圈，也不必因此而牺牲城市应有的烟火气和“旧质生产力”。举个例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级人才，也需要基础服务人员，人们还需要在工作之余有休闲的去处，同样遵循铁塔原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更没有必要去硬拼新质生产力，扎扎实实做好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也许更现实、更重要，就像哈

尔滨把冰雪观光和旅游做好也是战略正确的，那是中国经济的塔身和基座。

全世界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超英赶美”的产业大跨越，结果短暂的高光之后就是长久的停滞甚至崩盘。因为很多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国家只能扭曲资源配置，强行补贴，结果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我们一定要记得铁塔原理，不建基座和塔身而只建塔尖不过是痴人说梦。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其内在逻辑一脉相承，清晰而坚定。

第二组辩证关系是创新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创新。能不能创新，尤其是能不能高水平地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能不能大发展的命门。这也是在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创新排在首位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创新既有市场化的力量（即无形之手，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也有行政化的力量（即有形之手，用政策体制引导资源配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上，这两个创新之手的辩证关系非常清楚，必须以市场化创新为主，行政化创新为辅。

因为新质生产力既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一定的可知性，但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技术路线永远是动态的。未来产业本身就有巨大的不可知性。就人类迄今为止的探索来看，对于有高度不确定性，尤其是不可知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交给市场，这也是新质生产力所对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因此，中央给出的建议就是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打通生产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统一大市场。

相比之下，行政力量、举国体制主要用来攻克方向与路线都已经十分确定的基础创新，绝不是将所有创新都交给举国体制。即便需要举国体制，中央的用词也是新型举国体制，也就是融合了市场化力量的举

国体制。比如国家通过成立投资母基金的方式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而未必是亲自下场搞研发。

因此，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就像一辆自行车，后轮是动力轮，要交给市场这个无形之手，以应对不确定和不可知的问题。前轮是平衡轮，要交给政府这个有形之手，以应对市场失灵问题、发展失衡问题和方向问题。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一定是双轮并用，不能把双轮自行车变成独轮车，过度自由化和高度集权化的国家长年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独轮车仅保持平衡就已经十分费力。

当然，理解新质生产力需要阅读的文章和需要理解的逻辑还有很多。比如人才和资本。没有人才，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不是人多力量大的问题。没有资本也不行，科学家做实验，企业家做投资，都离不开资本投入。同时，资本回报也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重要动力，不能指望大家都只靠情怀做事。因此，新质生产力强国一定对应着教育强国、金融强国、统一大市场和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我们要大力度推进教育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提升社保与医保流转便利度，还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尤其是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融合全球的人才资源和资本力量，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所用。因为篇幅关系，不再赘述。

本书最后一章聚焦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因为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内在要求，但不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内涵和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和基本逻辑。

在此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邀约，感谢北大国发院老师和所有贡献深刻见解的学者、校友的支持，也感谢读者的关注和阅读。让我们一起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贤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2024年2月7日

北京大学承泽园

第一章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

本文根据作者2022年初在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新闻联合策划的“全球经济十一问”系列专访中的发言整理。

如何理解全球变局的逻辑与中国经济的定力？^注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林毅夫^注

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振聋发聩。参见：
http://www.qstheory.cn/zhuanku/2021-08/27/c_1127801606.htm。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论断。^注

为什么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经济学家，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从经济基础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角度来理解。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这八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2000年，八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跟原来八国联军的构成基本一样，只换了一个国家。众所周知，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解体，从此退出强国行列，其地位被加拿大取代。

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上述八国的GDP基本占世界GDP的一半。经济是基础，因此整个20世纪，世界是和平还是战争状态，基本

取决于这八国之间的关系。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跟奥匈帝国结成同盟国，其他六国结成协约国，这八国没能处理好关系，一战因此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成轴心国，其他五国是同盟国，同样是因为这八国没能处理好彼此的关系，二战爆发。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走势主要由这八国主导。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世界就稳定；处理不好，世界就可能爆发战争。

为什么说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到201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集团经济总量占比已降至34.7%，也就是占世界GDP总量的1/3多一点儿。过去，只要这八国处理好相互间的关系，世界上的麻烦事就基本能摆平。现在，这八国因经济地位下降，很多事再也无力主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此前的经济危机，只要八国达成一致，全世界会跟随它们的政策步伐，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但面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八国集团的力量不足，最终通过召开二十国集团会议来寻找对策。

因此自2008年以后，二十国集团就成了主导世界政治、经济以及关系人类福祉的重大事件的权威机构，这一情况是百年未有。过去的世界由八个工业国家主导，现在的世界由这八个工业国家和其他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共同主导。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这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化，也是经济格局变化引发治理格局变化的外在体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因为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6%，只有美国的11.8%；而中国2020年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4%，美国的70.3%，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一国的国际影响力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扩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的是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崛起。

为何中国容易被西方误读？

对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来说，当它发现第二大经济体在其身后不断快速追赶，与自己的差距不断缩小时，心里总会不舒服。这好比两辆差不多大的卡车，跑在前面的卡车司机看着跑在后面的卡车，它的体量跟自己的卡车差不多，但速度却比自己的快，心里肯定会有点不舒服。面对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守成大国会觉得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和号令世界的能力在下降，我想这种不舒服由此而来。

200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约为30%，现在却被中国赶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想美国的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其实美国不只对中国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追赶美国时，美国也采取了很多限制日本发展的措施，如“广场协议”。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追溯，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新兴大国赶超守成大国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曾上演15次，其中有11次引发了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此外，中国的崛起道路与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这一点也容易引起西方国家的理解。

我们知道，西方对中国的赶超是从18世纪开始的，西方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马克斯·韦伯认为，英国人从信仰罗马天主教转向信仰基督新教后，思想理念发生了改变，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

很明显，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此不同，这也是引发不理解的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守成大国面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以及

自身地位下滑引发的情绪性反应。

中国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做出什么样的转变？

从一个贫弱之国发展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需要相应地调整自身定位与对外政策。

过去中国国力相对较弱，当时我们的心态主要是学习借鉴，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国内经济发展好，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期望。

结果，中国以奇迹般的速度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追赶。从购买力平价看，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们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世界上90%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都极其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和政策肯定会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我们的认知也必须随着国家地位的提升而与时俱进。

对世界而言，中国现在是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自己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正如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中确认的那样，“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民的权利和追求，我们有必要让全世界了解这一点。

此外，我们还必须让全世界理解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发展模式不同。

根据2023年数据，日本已成为第四大经济体。——编者注

西方国家在借工业革命之东风发展壮大后，基本都走上了殖民化的道路，通过殖民其他国家和地区来掠夺资源。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

之路，完全通过市场交易来发展经济。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熟悉贸易理论的人都知道，贸易是双赢的，但总体而言小国得到的好处比大国得到的好处更多。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跟美国差不多，因此中美两国通过贸易得到的好处也基本相当。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日本的2.8倍。^②虽然中日两国都能通过贸易得利，但日本得到的好处更多，经济规模比日本小的其他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发展的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也是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中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做好了自已的事。中国的发展不只惠及中国人民，更是为增加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做出了贡献。中国是通过公平贸易而非走殖民主义道路来实现发展的。因此中国发展得越快、体量越大，对世界人民的福祉贡献也越大。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方式，向全世界解释清楚中国的发展能为世界人民福祉做出贡献。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中国发展的逻辑和追求，让世界了解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关心世界，承担大国的责任。

目前世界上仍有很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需要得到外部的援助。一国如果没能解决好内部事务，可能带来各方面的不稳定。比如经济不稳定会导致难民问题，无论是经济难民还是政治难民，都可能给他国造成负担。过去中国经济体量尚小、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但现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有能力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多好处，我们也应该把这些事情讲好并做好。

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虽然我们可以以史为鉴，但历史不会总是重演。前文我们提到过，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新兴大国赶超守成大国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曾上演15次，其中有11次引发了战争。乍一看战争发生的概率很高，但我认为过去的事情不见得会再次发生，如果仔细分析，今天的状况跟过去还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过去的新兴大国在超越守成大国时，两国的人均GDP水平差不多，产业结构也非常接近。第二，过去新兴大国超越守成大国的那个时代还是殖民时代。一旦守成大国被新兴大国超越，就意味着前者必须将殖民地让渡给其他国家。因此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弱国的利益会被强国的利益取代。现在，我们已告别殖民时代，经济的发展方式也转变为全球贸易。

在产业结构方面，中美两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决定产业结构的是人均GDP，中美两国的人均GDP差距很大。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突破6.5万美元，而我国人均GDP才刚刚超过1万美元。不难看出，我们还在追赶阶段，双方的产业结构基本互补。我国发展得越快，越需要美国产品，也可以给美国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生活必需品。所以我国的发展对美国也有好处：一方面，为美国商品创造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另一方面，为美国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既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互利双赢的。这和历史上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产业关系有明显不同。

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倘若真的爆发冲突，都会遭受巨大损失，更不用说战争了。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利双赢，我想只要守住这个底线，中美两国就可以求同存异。中国要发展，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1/4的水平，其经济规模就会变得跟美国一样大，我认为这是一定的。

因此，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历史经验，还要结合当前的世界格局，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盘。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还是让两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国要发展，中国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了，美国人民也能生活得更好。我想这也是美国人民之所愿，更是中美两国合作交往最重要的基础。

如何理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思潮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有学者简单地认为，这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格局导致的。但实际上，全球化是可以实现双赢的。

比如近年来，美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卖到美国的产品非常便宜，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败。这些人的观点是，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被中国人取代了。其实从奥巴马时代开始，美国就希望实现制造业回流，特朗普执政时则变本加厉，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

贸易战让美国如愿了吗？美国还在从中国进口它需要的绝大多数产品。就算制造业移出中国，也是转到越南、柬埔寨等国，根本无法回流到美国，就业机会也同样无法回流到美国。因此，美国发动贸易战是损人不利己。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一旦提高关税，美国老百姓就要为此支付更高昂的价格。退一步讲，如果把制造业转移到他国能够解决问题，这么多年来美国早就该开始布局了，无须等到今天。之所以没出现转移，只能说明把制造业转移到他国的成本更高。

无论是把制造业继续留在中国，还是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家，美国消费者都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生活必需品，老百姓的生活肯定受到影响。因此，把欧美国家分配不均现象简单归咎于全球化是找错了原因。如果按照这种错误的思路来解决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付出